

□赵桂琴

正在热映的《长安三万里》以豆瓣评分8.0分高开，截至7月24日0时0分，票房突破12亿元，可谓火出了圈，更有人将这部首次通过动画塑造李白形象、有着史诗格局的电影誉为国漫史上的一朵奇葩。撇开片中为了故事连贯所需而做的那些背离历史的改编“硬伤”，总体而言，这的确不失为一部画面精美、情节感人、底蕴厚重、意境深远的好电影，值得一观。

只是，在满足对大唐浪漫主义的全部想象之后，我们也应当还原一下历史的真实模样。比如，高适与李白原本是通过杜甫相识的，而非邂逅于洞庭湖畔的少年知己；目前也并无证据显示，高适曾对因投靠永王而深陷囹圄的李白暗中相助；李白的确不太“靠谱”，但电影中将其演绎得也着实有些夸张……而电影中没人在意的杜甫，其实才是大多数普通人不愿接受却穷其一生也难以避开的那个“拧巴”的自己。

我们先看李白，妥妥的偶像范儿。他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狂放浪人，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饮君子，是“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的浪漫诗仙，多少人膜拜在他“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酒脱及“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豪放之下。众人皆叹他的作品何其浪漫，殊不知他做人却是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在诗中肆意展现追求现世享受的生命观，渴望闻达，热爱高光环绕的生活，入赘宰相孙女的婚姻选择难逃趋炎附势之嫌。当然，他才不介意世人是否会嚼舌根。身为商人之子无缘科举，却成功走通玉真公主的“终南捷径”，给他带来一段生命中的高光时刻。被谤辞职后虽也心情抑郁却很快能够自洽释然：“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投身永王李璘以期最后一搏，是政治嗅觉的钝感幼稚，然不甘寂寂一生的投机心理也再次暴露无遗。只是，这充满讽刺的一切皆因他是李白而化为传奇。

众生仰望李白，只缘：就作诗，他达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天才的高度；就做人，他身上这种浑不吝是众人只能艳羡却不敢学且学也学不来的落拓不羁的处世态度。

再观高适，有着安东都护之孙的身世，却家贫潦倒，三十多岁科举落榜，再次耕钓于宋城十多年之久。这个自带能量的小宇宙，自己身处困顿居然还能乐观激励朋友：“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想必这也是他当时的自勉之词吧。他46岁时才在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宋州刺史张九皋推荐下，应有道科（指有道德、有才的人可以被举荐为官）中第，获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封丘尉。三年后辞职，又得到唐朝名将、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的赏识，从而用14年的时间实现了从小小办事员到散骑常侍、渤海县侯的阶层跨越。

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就是高适这样的人吧。他目睹了“戍卒厌糠核，降胡饱衣食”，也见识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心头的那团小火苗却依旧在燃烧。与被时代压垮的大多数人不同，他在大时代的变迁中顺势而为、与之共舞。安史之乱击垮了杜甫，永王叛乱沉沦了李白，高适却在平讨二乱中脱颖而出，一路官至淮南节度使、剑南节度使，跻身一代封疆大吏。不禁令人联想起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

杜甫才是那个『拧巴』的自己

《长安三万里》的浪漫滤镜背后——

【文化观澜】



笔墨：“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致敬高适，因为他是我们身边每一个初心如磐、砥砺前行英雄主义者的最佳励志范本。连《旧唐书》也不得不点赞道：“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再让我们把镜头聚焦于杜甫，他的笔下是“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翁，是“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兵车行，是“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人生无家别，何以辞黎黎”的三吏三别，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穷苦书生，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追赶抱茅群童的踉跄老翁，是我们都想逃离却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世界的缩影。

因此，与杜甫相比，众生多更爱李白。连余光中都说，“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把胡马和羌笛交战的节奏，留给杜二去细细的苦吟。”至于李白，天子也当他是“谪仙人”，自然可以随心所欲、特立独行，“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这一生，高光时刻刻刻好，落魄境地也罢，活的就是一个恣意，决不违心，勿论摧眉折腰。放眼古今，凡人能够？人生如此，何憾之有！

摹杜甫悲天悯人之情怀，藉李白之活法，去成就如高适般的一番功业，是很多人的理想人生。只可惜，现实总是过于骨感，“剧终”时大多数人活成了那个“拧巴”的杜甫，李白和高适却变成了梦中的“彩蛋”。这或许也是不少中年人观看《长安三万里》竟至泪奔如雨的原因吧。初看不解剧中意，再观已是剧中人。

然而，BBC纪录片中称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木心说：“如果抽掉杜甫的作品，一部全唐诗会不会有塌下来的样子。”早在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杜甫的孙子杜嗣业将杜甫骸骨自湖南岳阳背回河南偃师与祖母杨氏合葬时，元稹便为杜甫撰写了《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并一反盛唐以来长期冷落杜甫、忽视杜诗的社会风向，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了杜甫现实主义诗风的历史作用：“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从而将杜甫推上中国古典诗词“诗圣”的宝座。《旧唐书·杜甫传》全文收录了元稹对杜甫的赞誉，并说：“……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

若说杜甫前半生过的是不谙世事、裘马清狂的司马公子（其父杜闲曾任奉天令、兖州司马等职）的快意生涯，在他的后半生，这个屡遭多舛命运痛击、困苦生活摧残仍旧胸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救世理想的倔强儒生，则将其饱尝的人生百味皆化作笔下的沉郁顿挫，在命运的淬炼下，他涅槃成为一位为人民疾苦泣血呐喊的苦难诗人。鲁迅先生说，悲剧即是人生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没错，杜甫是一出令人唏嘘的悲剧，他却记录下下一个完整的历史天空，成为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正是这支悲怆的命运交响曲，将杜甫和人民紧紧融合在了一起，融进这历史长河的滔滔洪流之中，因而成就其伟大。历史原本不就是人民写就的吗？想到此，微如草芥的我们，心底是否也泛起丝缕欣慰？

□许志杰

唐代李世民被史家称为中国封建王朝最“伟大”的皇帝，没有之一；由他奠基的李氏唐朝被后人视为“伟大”的朝代，好似也没有之一。这可能基于几个方面，一是唐诗影响巨大，一大批伟大的诗人应运而生，若无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时代，不会产生那么多空前绝后的诗篇。二是唐朝开创了影响世界的文化政治体系，吸引大批日本遣唐使前来学习，激发了后世东瀛之国的锐利进取。三是构筑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国际大都市长安。

令人意想不到的，如此辉煌的唐王朝奠基者李世民的传记，竟然出自一位英国的汉学家。193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李世民的英文传记，翻译成中文书名是《天之子李世民：唐王朝的奠基者》。作者费子智（1902-1992），生于伦敦，在悉尼去世。他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作家，1923年至1950年在中国居住和工作了15年，曾在中国云南对白族历史与现状作深入研究。费子智喜欢中国，非常推崇中国文化，1950年离开中国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创办东亚研究所，推介中国文化，有《中国文化简史》《武则天女皇》《五华楼》等影响深远的英文著作。作为一名汉学家，费子智可用史料十分有限，从他写李世民所列参考书目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为首，其他还有《旧唐书》等，着实不多，创作“源泉”不足。一般认为这样会限制作者的想象空间，因为史料对于历史人物传记而言，如同小说作者的实践活动，没有生活，哪得素材与灵感？但是，身兼历史学家与作家双重身份的费子智，在对史料的筛选与运用上可谓匠心独运。史家的执着、作家的灵动，在李世民身上碰撞，就是一部完美的历史人物传记。前已述及，唐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高光时刻，但唐也是历代官廷受到攻击最为严重的王朝，且不说安史之乱致使唐王朝倾覆，更有两千多万百姓无辜被杀。仅王朝内部的官斗，大大小小无以计数，著名的有李世民主导的“玄武门之变”，他个人登基当了皇帝，以及发生在李世民执政时期的皇太子之争，由此引起血腥搏斗，生灵涂炭。对于上述形形色色之官斗，史书记载很多，但一般仅限于发生在长安的明争暗斗。岂不知，李世民执政时期发生在长安的太子之争，波及较重的还有齐州首府济南。对此，费子智颇费笔墨，做了比较详细的描写，可谓拾遗补阙，为历史打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补丁。

李祐是唐太宗的第五个儿子，被封为齐王，派到齐州都府济南。隋朝一度把济南改名济州，唐袭隋制，初期一直延续济州称谓，中期后改回济南，为齐王府所在地，故称济南府。李世民把李祐派到济南，是想通过在地方基层行政工作中积累经验，以此锻炼年轻的儿子。李祐当时很年轻，李世民就住他的府上派了几位经验丰富的大臣为他出谋划策，同时也是作为线人监视并向皇帝报告齐王的行踪。李祐似乎天生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又受到他母亲阴妃家族中一些野心勃勃的人影响，特别是他舅舅阴弘智致力于培养外甥的狼子野心，向其灌输以刀枪军队稳固王位甚至夺取皇位的思想。李祐渐被舅舅掌控，开始征召敢死队员，购置刀枪，每日抓紧操练。齐王的叛乱开始了。费子智把智慧的济南人民描述得非常可爱：“济南府的民众比他们的统治者更有清醒的常识。他们意识到，这个愚蠢的年轻人要对抗整个帝国的兵力和权威根本没有胜算。然而，如果他们帮助他造反，他们的城市将为这种愚蠢行为付出惨痛代价。他们没有按照齐王的命令投奔叛军，而是纷纷趁着夜色越过城墙逃到别处去避难了。”

针对齐王叛乱，李世民曾“敕书诘诫之”，但愚蠢的李祐放弃了最后的投降机会，准备固守济南城。他的一意孤行并未得到驻扎济南的正规守备军的支持。官兵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试图对抗皇帝的野心及举动都是愚蠢的，也是徒劳的。何况李祐手底下只有一座城池的几百名守军以及招募到的数百名亡命徒，根本不堪一击。官兵们先是在一场宴会上袭击了齐王及其党羽，而后又将齐王府包围。李祐率极少亲信随从抵抗了一个晚上，直到官兵扬言将放火烧掉宫殿，他才不得不提出在确保自己及亲信生命安全的前提下投降。费子智这样写济南府守备部队军官的回答：“齐王现在已经在已经是一个公开的叛乱者了，任何与他勾结的人都是罪犯。”齐王无条件投降，参与叛乱的亲信被就地处死。李祐被押往长安，接受皇帝老子的审判，没几年就死在流放地。

费子智曾于1955年出版《武则天女皇》英文版，在欧美英文阅读圈颇受好评，可惜目前尚无中文版。作为在欧美影响至大、至深的汉学家，费子智的名字在中文阅读圈却有些陌生。笔者“认识”费子智，是在阅读考古学家吴金鼎《云南苍耳境考古报告》一书时，看到书中多处提及费子智，两人还有在大理携手考察古迹的行踪。按图索骥，又找到多种费子智著作，其中就有《天之子李世民：唐王朝的奠基者》。书中描述齐王在济南府的叛乱闹剧，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是被过往史家忽略的一段真实的历史过程，表现出济南民众的坚定与智慧。向先民致敬，同时致敬费子智。

【读史札记】 费子智笔下的唐太宗和济南